

能力构型、交易成本与治理模式的协同演化 ——一个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

王益民, 宋琰纹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文章运用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 基于企业组织层面及地理空间层面能力构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构造了一个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和完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的局限, 同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升级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协同演化; 能力构型; 交易成本; 价值链治理; 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14.1; F2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2-0221-08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深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产业集群的生成机制, 并进一步影响其演化升级的路径^[1]。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 当地集群的发展已经不能再以传统的孤立视角来考察, 而必须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联系网络之中来审视。正是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VC)分析范式应运而生, 开辟了当地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新的理论视角。但随着研究的深化, 人们日益认识到应把产业集群视作一种更加开放的复杂系统, 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与当地集群之间, 事实上存在一种内生性的互动演化关系, 因而两者应该有机地融合到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框架之中^[2]。基于此, 本文运用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来弥补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中的不足和局限, 力求对当地集群升级发展问题取得更深入的理解。

一、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理论贡献与内在局限

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把当地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相联系, 从价值链治理模式出发, 分析治理模式所导致的组织间权力不平衡配置关系对当地企业升级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4]。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的一个核心理论命题是, 当地产业集群的升级潜力与路径, 因它们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属性特征的不同而异^[5]。换句话说, 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具有不同的治理模

式, 而这些不同类型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于当地集群升级具有不同的影响和含义, 因而当地集群的升级只有在其自身与全球价值链运行的互动关系中, 才能够得到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近来国内学者快速地吸收、借鉴了全球价值链理论, 依托这一分析范式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当地产业集群升级这一问题进行了多个产业的案例分析^[6-7], 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一互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虽然成功地基于治理模式框架对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权力不平衡配置格局作出了深刻的剖析, 但是从同样的理论框架出发, 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问题所做的分析, 却存在一些内在的局限性。

首先, 没有真正触及集群升级过程中复杂的多层面互动这一本质特征。当地集群的升级涉及到企业组织、产业、区位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复杂互动。集群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经济单元, 升级过程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当地集群由不同类型的组织群体所构成, 当地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 对于当地集群的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 当地集群作为一种中观层面的空间经济单元, 其本身又同时处在当地制度情境、经济体系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等不同层面的互动过程之中。因此, 由于涉及到多层面复杂的互动过程, 当地集群的升级与单一集群企业组织的升级不能简单等同。

为了理论抽象的需要, 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忽略

收稿日期: 2009-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协同演化视角下的跨国公司战略与产业集群互动”(04CJY001)

作者简介: 王益民(1971-), 男, 山东菏泽人, 博士,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跨国公司管理。

了集群当地联系这一层面,即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跨国公司所主导的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当地集群企业在价值链当中的位置对其升级潜力的影响这一方面^[5]。如此一来,当地集群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内容的地理空间经济单元,实际上就被概化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节点”,变成了一个“黑箱”。显然,这种忽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当地集群升级问题上的理论解释力。因为这一研究视角的初衷,就在于更深入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与全球化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在理论分析时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又倒退了一大步”^[8]。也就是说,它以全球化的广阔视角为当地集群研究引入了外部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非常重要的侧面,但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它又把外部知识联系作为集群升级的主要根源,而相对忽视了当地互动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同时,由于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将价值链治理结构作为知识转移、扩散的基本条件,因此它也不能给出当地集群自身知识体系(能力、技术)与外部复杂互动机制的全面理论解释^[9]。

其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更明显的局限还在于,其治理模式是外生的,静态的,因而不能提供内在一致的内生性分析框架,在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中讨论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的升级问题。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表现为一种外在给定的“结构”,并且正是这种“结构”及其属性(治理模式)规定了当地集群的升级机会与升级路径^[10]。从这一意义来说,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带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对全球价值链这一结构当中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处于底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主体内在的能动性体现在何处、如何发挥等重要问题着墨不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确可以获得某些产品、流程甚至功能上的“升级”机会,但这本身却不足以提供集群升级的内在持续动力^[11],因而自身产业发展所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内涵与逻辑,在全球价值链的固有框架之下是难以找到的。

从理论渊源来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析架构属于一种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核心的比较静态分析模式,因此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用来分析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权力配置格局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解释力,但对于“集群升级”这一本质上“动态”的问题,却不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12]。比如,它侧重于讨论在既有的治理模式之下现有集群企业如何升级的问题,但却不能解释这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原点”问题,

即特定的治理模式从一开始为什么能够(或不能)产生、构建起来,以及这种特定的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什么在特定地点(而不是在其他区位)形成并发展起来,等等^[13]。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来说,这种初始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值得强调的是,在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当地集群本身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虽然近期格里菲、汉弗莱等人也开始考虑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演化这一重要方面^[3],但拘于其固有的理论范式缺憾,它仍不能回答一系列核心问题,比如:演化过程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演化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总之,源于世界体系理论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深刻揭示了价值链的内在结构和治理模式如何导致了价值创造能力的不平衡分布和配置,再次让人们认清了全球化背景下“依赖式发展”新的表现形式的本质^[13]。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必须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超越于这一分析范式,更进一步揭示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升级的本质。事实上,一系列的经验研究文献已经证明,不能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现有治理模式之下所提供的机会来自动地获得升级所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当地产业集群只有真正成为由多样化组织学习、创新努力所形成的网络联结,才可能与全球价值链所提供的外部机会产生良性的互动^[11-12]。显然,要深入理解当地产业集群的升级活动,还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必须动态地将全球价值链与当地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包容进来。

二、协同演化分析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协同演化”(co-evol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近十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在组织理论、战略管理、演化经济学以及近来的跨国公司理论等研究领域的影响日益增强^[14]。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实际上是集成了复杂科学、生态学以及演化理论等众多学科领域思想的精髓^[15]。这一研究框架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强调变化过程中的多层面性、根植性、反馈效应与嵌套效应、路径依赖性等,将微观层面的演化和宏观层面的演化纳入到一个一体化的架构中来,有助于准确地揭示历时性过程之中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双变”的内生性关系,从而有利于更为整合地来剖析不同层面内生互动关系的机理^[16]。

全球化竞争背景下,跨国公司战略与当地产业集

群之间的互动演化过程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多层面性和复杂系统性,既包括了企业组织微观层面,也包括了中观、宏观的层面如集群(空间经济单元)、产业乃至制度情境等;既涉及到当地联系与当地根植性,同时也涉及到全球价值链之中的网络联系与网络根植性,并且正是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决定了当地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生成、演化与升级的轨迹和路径。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全球价值链,不过是围绕某一核心产品(技术、体制与标准等)所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内各组织之间权力配置的模式。每一条价值链都是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产业情境条件下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具体结果;而每一次的产业转型或产业竞争生态的演替,都同时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关系模式的彻底重构。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既是规定旗舰企业与其供应商群体如何进行互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又是这些战略行为主体之间互动过程的产物^[17]。因此,把当地集群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理解为一种协同演化的过程,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研究视角。从协同演化的视角看,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并不是外在给定的,它本身其实就是价值链核心企业(跨国公司)与其他参与者(供应商)互动演化过程的内生性结果。因此,把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融入到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当地产业集群升级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来,实现与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获得更大的理论解释力。

三、能力、交易成本与治理的协同演化：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析模型

本文在吸收近年来组织理论以及战略管理领域相关前沿进展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分析模型,以此来弥补和完善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一) 协同演化分析模型的理论前提

近年来,组织理论、企业理论等研究领域的学者越来越趋向于整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以及组织能力理论,从协同演化的视角来揭示治理模式、交易与能力之间所形成的“三位一体”关系^[18]。这些新的理论都侧重于强调,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内生性的,而且也是异质性的,它不仅取决于交易条件的特征,而且也取决于特定组织所拥有能力的特性以及组织自身所塑造出来的治理结构情境的特性。从动

态发展的角度看,在交易成本、能力以及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协同演化式的内生互动过程(图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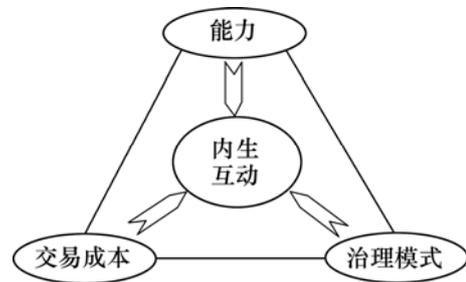


图1 组织能力、交易成本与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不同组织之间(比如旗舰企业与供应商)的专业化分工首先取决于沿价值链分布的能力异质性,因为正是它构成了潜在“交易收益”的来源。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假定某一价值链具有两个构成部分: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为了使中间产品市场交易的存在有意义,某些企业必须具有很好的上游能力,但却不具备很好的下游能力,这样交易才对双方有利。如果有效的上游企业,其下游价值链活动的生产效率与其它下游企业同样高,那么无论潜在的交易成本是否存在,企业之间可能都没有形成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相应治理机制的内生意愿^[19]。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组织之间沿特定产业价值链展开协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两套相互补充的、但又各不相同的能力构型。协作所产生的收益并不仅仅来自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更取决于协作活动的能力互补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收益是动态的,它还来自于协作开始之后双方或者合作某一方针对关系特定资产所作的投资,以及伴随着协作的深入所展开的组织学习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交易属性”或孤立地依赖交易成本的观点来解释组织间的治理模式,这一点近年来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指出^[18-19]。

(二) “能力构型”基本概念的界定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与独特资源以及相应的能力内在相关。组织的能力构型则取决于其从事各种价值活动的具体组合、协调方式以及独特资源存量^[20]。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价值链活动不同阶段之间,能力是异质性分布的。这是因为完成复杂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一般是在特定的组织中通过一种长期的、路径依赖的组织学习过程发展而来的,在这一复杂过程中,存在各种随机的、偶发的因素影响组织能力的产生和形成^[21]。

同样的,一个特定区位或空间经济单元(如集群)也可以被描述为各种经济活动、资源以及知识基础等

所形成的集合体。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借鉴 Lawson (1999)以及 Ricart 等人(2004)的观点,把特定区位空间经济单元已有的独特价值活动以及资源、知识基础统一称之为特定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它是该区位动态聚集经济以及区位竞争优势最为核心的基础^[22-23]。与企业组织层面能力构型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定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与区位特异性相联系,并且往往与自然条件、制度安排、企业群体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能力构型既与该空间经济单元中每一个组织的资源与能力有关,但同时又不是这些组织能力的一个简单加总^[24]。和组织层面相类似,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在产业空间疆域中的分布也不是均质的。通过特定的能力构型,特定区位能够有效地促进规模经济、累积性学习、比较优势、活动间的协调与共享等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从而使沿着全球价值链分布的各种组织能力的分布更具差异性。

(三) 协同演化分析框架描述

本文主要从企业组织层面和地理空间层面互动演化的视角,来描述能力构型、交易成本(情境)以及价值链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具体体现为四种演化机制在不同层面互动作用下的协同演化过程,如图 2 所示。

1. 能力构型的不对称分布影响和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

首先,从企业组织层面来看,全球价值链中企业间能力的不对称分布影响和决定了特定形式的价值链治理模式,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跨国公司与其它价值链参与者(供应商)之间的战略行为互动,同时这一互动过程会产生出什么类型的特定治理模式,还取决于

特定交易成本条件的中介性影响效应。其次,不同企业组织异质性能力及其在不同地点聚集性质的差异,又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了地理空间层面上区位能力构型的不均质分布,从而影响和决定了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特定价值链的整体构造或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因此,企业组织层面与地理空间层面通过空间聚集效应的互动反馈,相互联系并交叠在一起。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第一,当地企业(或区位)的能力构型是嵌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并进而形成特定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而空间聚集效应的存在,则进一步使能力构型的异质性得以放大或强化,从而最终使当地集群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第二,由于特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产生与形成取决于企业、集群的能力构型异质性、特定交易条件(交易情境)以及不同组织间战略行为的复杂互动过程,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异质性的。比如,对大陆台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调研表明,即使在同一产品领域内也同时存在着多种价值链治理模式,其中的异质性很难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来简单概括^[25]。第三,企业组织层面与地理空间层面的能力构型是互动演进、相互联系的,比如强有力的区位能力构型可以使集群特定企业在全价值链治理模式所决定的权力关系中取得更为有利的地位,反过来集群核心企业能力的动态发展也会对整个区位能力构型产生重要影响。

2. 通过塑造交易情境激发交易成本的内生性降低

在上述协同演化模型中,价值链治理模式实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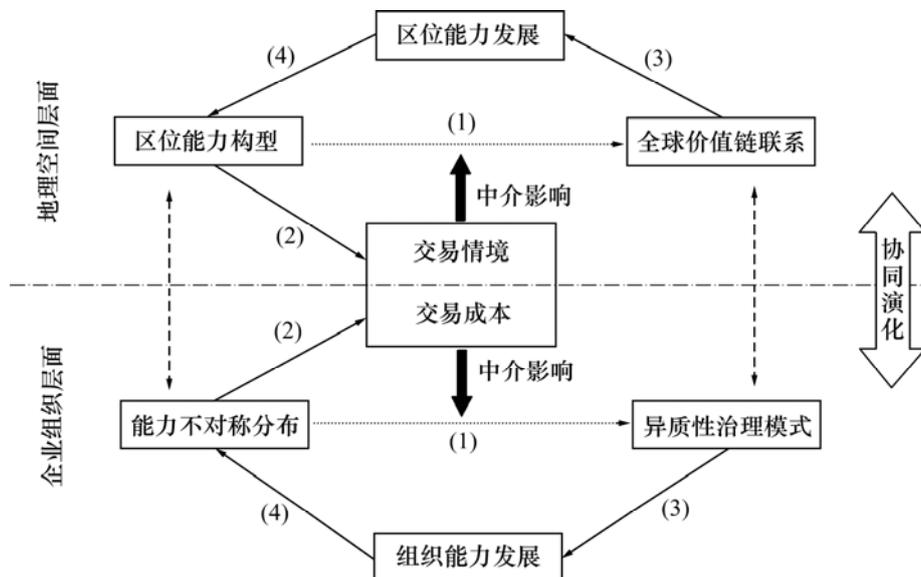


图 2 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能力、交易成本与价值链治理模式内生互动过程

是跨国公司与其它企业组织在沿价值链形成不同能力分工体系的互动过程中, 不断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战略努力来影响和重塑其交易环境的内在结果。换句话说, 交易成本决不仅仅是一种给定的外生因素, 而应该被视作企业能动地依照自身有利条件去应对和塑造其交易环境的一种产物^[19]。尽管交易成本情境在短期内来看可以理解为固定不变的, 但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看, 交易成本只是一个起调适作用的中间变量, 并且其本身受制于这一复杂的协同演化过程。

正是这样的观点, 使本文的研究框架有别于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后者中, 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问题被归结为从各种外在可选的治理模式“菜单”中选择其一; 而本文则认为, 这一治理模式选择“菜单”本身也是经由协同演化过程而内生的。也就是说, 尽管从短期来看, 一个特定的治理模式最优选择受制于相对固定的交易环境; 但是从较长时段来看, 企业则完全具有塑造整个产业或区位交易成本情境的能动性^[19]。其实, 从产业动态演化的视角看, 新的交易治理模式的创造, 往往本身就构成组织能力的一部分。这方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 在创建北京星网工业园的最初阶段, 由于受制于中国的关税政策环境, 诺基亚无法实现与其供应商群体的高效协同, 但通过与中国特定区位的积极互动, 诺基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虚拟保税区”模式, 突破了政策环境的制约, 并使其成为当地产业集群推动整体交易成本降低的动态因素, 最终重塑了当地集群的交易情境^[26]。

3. 价值链治理模式反馈影响能力构型的发展过程

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中, 能力因素与价值链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作用, 即能力分布与能力构型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 反过来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其变化也会对能力的发展过程、性质以及演化路径产生影响。

特定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形成特定的生产活动制度结构。在选择机制的不断作用之下, 企业组织之间会基于各自不同的能力, 使全球价值链的这一特定结构在动态过程中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效应, 从而使不同组织或区位的能力构型异质性沿着特定的演化路径被不断强化、放大。例如, 在个人计算机产业中, 惠普、戴尔等跨国公司在与其台湾供应商群体的互动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以“订单跟随”(BTO)以及“卖方管理存货”(VMI)等制度安排为核心的价值链治理模式。而在这一模式的驱动下, 一方面使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供应规划与准时需求实现的核心能力得以不断强化, 另一

方面也迫使台湾 IT 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流程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从而使台湾 IT 集群形成了依托 OEM/ODM 大规模生产体系的独特能力构型^[27]。

4. 能力构型的转换与产业集群的演替迁移

从某一特定的时点来看, 外部诱因(如竞争生态变化、技术变革等)的驱动可能导致现有的能力构型发生转换, 从而改变产业的性质以及潜在进入者/产业参与者的构成, 此时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就面临被重构的可能。具体来说, 当新的、更为先进的能力从现有知识基础当中产生出来, 并且与全球价值链中现有结构及其治理模式不相协调时, 原来推动价值链沿着现有能力分工体系深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可能发生逆转, 并可能最终启动新一轮的能力、交易成本以及治理模式的内生互动过程。

而从地理空间层面来看, 在反馈互动效应的作用下, 组织层面的能力转换可能导致集群或区位整体能力构型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位置的变化, 并最终重塑当地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内在关系, 即以新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为基础, 形成新的“集群网络”或产业空间疆域。因此, 协同演化过程不仅仅表现为能力构型、交易成本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演化的过程, 同时也表现为产业集群演替、转型与迁移等的产业空间疆域变迁过程^[27]。根据协同演化的视角, 可以通过一种历时性过程进一步考察区位能力构型转换与集群演替迁移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图 3 所示。

如图 3 所示, 在 t_0 阶段, 某一特定地理区位的能力构型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了战略耦合, 从而使当地集群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组成部分, 并形成特定的价值活动空间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集群的互动不仅推动了集群本身的演化, 而且当地集群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演变, 并进而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产业的演进以及产业竞争生态的变化, 如 t_1 阶段所示。 t_1 阶段的互动演化过程的重要结果反映在 t_2 阶段: 一方面, 当地产业集群内部组织之间竞争、合作的行为模式等逐渐固化为集群自身的深层结构,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集群独特的演化发展路径以及相应的区位能力构型; 另一方面, 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演化达到一定程度, 适应产业竞争生态变化内在要求的新知识、新能力就会出现, 从而也就相应地要求产业价值活动组织模式的调整与重组。由此, 当地产业集群的能力构型与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间在 t_3 阶段进行新一轮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全球价值链活动在不同的地理区位进行再分解、再配置以及重新组合等, 并在此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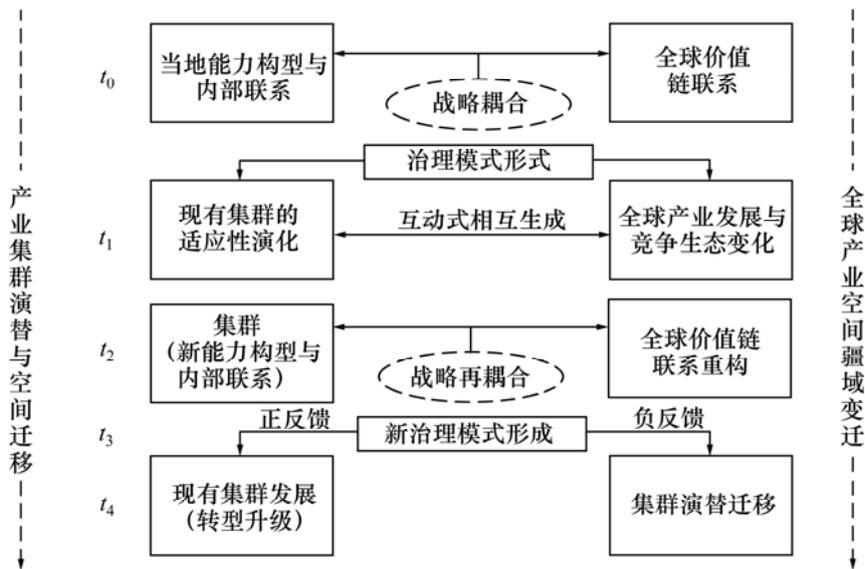


图3 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能力构型转换与产业集群演替迁移

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有新的集群生成与发展。但对于现有的产业集群来说，则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如 t_4 阶段)：一种是现有产业集群的能力构型动态演化与价值链重构过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即原有的价值链联系虽然被削弱或转移，但适应新产业竞争要求的价值链联系逐渐建立起来，从而使现有产业集群实现转型与升级；另一种情况则是，在演化过程中现有产业集群的能力构型已无法适应产业竞争生态的内在要求，这也就意味着集群已经被“锁定”在特定的演化路径上，集群的衰退变得不可避免，原来处于集群中的一些产业价值链活动逐渐被转移至新的区位，产业活动集聚的地理中心也会相应发生迁移。

因此，产业集群的演替迁移是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重构与当地集群能力构型协同演化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产业集群“演替迁移”可能表现为多种方向和结果，既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理区位之间，也可能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沿产业价值链的演变而展开；既可以是梯度式的、渐进的，也可能由于内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而表现为一种“断裂式”迁移^[28]。但是，从上面所描述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产业集群的空间迁移并不必然意味着原有产业集群的衰退与消亡。关键就在于协同演化的过程中，特定区位能否保持能力构型的动态发展。例如，90年代全球硬盘驱动器(HDD)产业从低成本海外生产阶段转向全球供应链高效运营阶段之后，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出现了明显的重构趋势。而新加坡HDD产业集群在高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下并没有衰退和消亡，而是依靠高水平的

柔性生产流程管理能力以及强有力的支持性配套产业体系，实现了区位能力构型的转换过程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的协同演化，从而推动了当地集群的升级^[29]。

至此，上文所描述的协同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析的理论框架，从而弥补了原有分析范式的不足。从上述过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这一组织现象，与当地产业集群这一地理空间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将自身的价值活动与地理上分散的、但同时又聚集于特定区位的能力构型(重要资源和知识)相联系，并通过其全球战略运作过程形成并维系特定的治理模式，以强化其全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战略、当地集群能力构型之间存在着互动演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动态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产业空间疆域的变迁过程。

四、结论与启示

在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当地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形成与发展，并进而使发展中国家当地产业集群成为跨国公司战略所塑造的全球产业空间疆域的内生组成部分；但反过来，当地集群的发展以及区位能力构型的改变，也会对跨国公司战略产生反馈效应，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演化的轨迹。因此，价值链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互

动演化过程的内生性产物。这一协同演化分析模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竞争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地理空间经济单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有助于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逻辑、能力发展以及演替迁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内在一致的理论分析。

从本文的协同演化分析模型可以看出,集群“升级”的本质是能力问题。因此,升级问题的研究不能“本末倒置”,也就是说,需要在借鉴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的同时,把研究视角逆转过来,重新强调当地集群的本地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战略与当地集群复杂互动关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这一互动关系如何推动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的协同演化过程?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当地产业集群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源才能有效促进自身升级转型?价值活动的突破与创新需要哪些内外部条件相耦合?等等。因此,只有在明确推动“升级”活动创新主体的前提下,从一种多层面复杂互动的动态视角出发,才可能对全球竞争背景下当地集群升级这一现实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

从根本上来说,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活动的主体是企业组织,集群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集群升级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在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组织的创新活动带动下实现了当地相关联企业群体的整体竞争优势提升时,当地产业经济活动的升级才能实现。然而,当地集群升级的内涵却不仅仅限于此。只有当特定区位的资源基础与能力构型与上述企业组织层面、产业层面的创新活动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时,当地集群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地理空间经济单元才会表现出动态的聚集经济,即形成一种动态的区位优势,集群本身的升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要做的是,使产业集群成为当地企业组织升级以及当地产业经济活动升级稳固的地域空间经济单元和基地,这才是集群本身升级的实质意义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推动集群区位能力构型的不断提升,才能使当地集群在全球产业空间疆域的变迁过程中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 [1] Giuliani E, Rabellotti R, Van Dick M. Clusters Facing Competition: The Importance of External Linkages [M]. Aldershot: Ashgate, 2005.
- [2] Buckley P, Ghauri P. Globalis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 81-98.
- [3]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 78-104.
- [4]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 37-70.
- [5]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17-1027.
- [6] 吕文栋, 张辉. 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战略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5, (2): 119-124.
- [7] 王益民, 宋琰纹. 全球生产网络效应、集群封闭性及其“升级悖论”——基于大陆台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4): 46-53.
- [8] Giuliani E. Cluster absorptive capability: why do some clusters forge ahead and others lag behind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5, 12(3): 269-288.
- [9] Bell M, Albu M. Knowledge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dynamism in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9): 1715-1734.
- [10] Schmitz H.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 [11] Giuliani E,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4): 549-573.
- [12] Morosini P. Industrial clusters,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performanc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2): 305-326.
- [13] Henderson J.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9: 436-64.
- [14] Jeroen C, Van Den Bergh. Coevolut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3, 13: 289-317.
- [15] Rodrigues S, Child J. Co-evolution in an institutionalized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 2137-2162.
- [16] Lewin A, Koza M. Empirical Research in co-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trategic adaption and change: The promise and the challenge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1, 22(6): 5-12.
- [17] Sturgeon T, Lee J. Industry co-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shared supply-base fo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Z]. Aalborg: Nelson and Winter Conference, 2000.
- [18] Madhok A. Reassessing the fundamentals and beyond: Ronald coase, Transaction cost and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 535-550.
- [19] JAcobides M, Winter S. The co-evolu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Explai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 395-413.
- [20] Porter M E. Locations, clusters, and company strategy [A]. Clark

- G L, Feldman M A, Gertler M 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3-274.
- [21] Teece D, Pisano G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509-533.
- [22] Lawson C. Towards a 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region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23(2): 151-166.
- [23] Ricart J, Enright, Ghemawat, Hart, Khanna.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 175-200.
- [24] Tallman S, Jenkins M, Henry N, Pinch S. Knowledge, cluster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4, 29(2): 258-271.
- [25] 杨友仁, 夏铸九. 跨界生产网络的在地化聚集与组织治理模式: 以大苏州地区信息电子业台商为例[J]. 地理学报, 2004, 36: 23-54.
- [26] Yeung 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network effects of local manufacturing cluster i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34(3): 520-540.
- [27] Fields G. Innovation, time, and territory: Space and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 of Dell Computer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82(2): 119-146.
- [28] Dalum B, Pedersen C, Villumsen G. Technological life cycles: Lessons from a cluster facing disruption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5, 12(3): 229-246.
- [29] Kenney M, Florida R. Locating Global Advantag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co-evolution of capability configura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governance: An endogen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WANG Yimin, SONG Yanwe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hand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From co-evol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ndogen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action cost, capability configuration and governance at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levels. Using this framework we can remedy the limitations of GVC paradigm effectively and get more insights about the upgrading log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co-evolution; capability configuration; transaction cost; governance of GVC; cluster upgrading

[编辑: 汪晓]